

·编纂与出版·

专栏导言

顾 青

拜读《文献》杂志多年,看到的多是以文献学的角度和方法来研究古代文献的文章。固然受益良多,又常常感到“不过瘾”:同样的课题,同样的材料,解决的问题似乎比较有限。因此,当《文献》主编约请我为本期专栏“编纂与出版”写几句导言时,我几乎毫不迟疑地应允了。因为,我的确对这个专栏有所期待,尤其是读完以下五篇文章之后,“有话想说”的冲动也愈发强烈。

多年从事古典文献出版工作,我深知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文献的出版是无法分割的。整理和研究的完成,仅仅意味着工作完成了一半,没有实现出版,整理和研究就没有落地,只有出版并被读者接受和使用,才真正实现了整理与研究的目的。而事实上,文献出版工作的实施,其本身就包括文献的整理、编纂和研究等等环节。甚至,我偏执地认为,出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工作的面貌和成就。遗憾的是,许多专业从事文献研究的学者,似乎并不认可这一点,甚至根本反对这一点。他们并不理解出版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也不会自觉地使用出版的思维和方法来看待文献的产生与流传。也就是说,许多文献的问题,仅仅使用文献学的方法和资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几年,我参与编辑出版一本学术期刊,名叫《中国出版史研究》,组稿始终异常艰难,因为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的学者,更习惯于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来研究出版物(文献),用版本学的方法来研究出版活动。在他们的学术成果里,常常看不到出版业的运作逻辑,没有读者群、购买方、销售市场、运营成本、商业竞争之类概念,更不会有意识地从这些角度去提出问题,搜集史料。这实在是一种遗憾。举例而言,从我早年做过的小说史研究来看,明清时期涌现的大量通俗小说文本,其推动力往往并不是小说家、文学家的创作冲动,而是书坊书商的牟利欲望;而小说经典如《水浒》《三国》的繁本简本的问题,用版本比对或文本分析,往往难以理出头绪,而运用出版业的逻辑,反而可以得到完满的解释。

带着这样的思路,来看本期专栏收录的这几篇文章,应该说,虽然还是会生出些许遗憾,但更多的是收获了惊喜。罗琴的《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周

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敏锐地从文献比对中拈出发生于康熙初年南京与杭州两地出版商之间的“尺牍大战”这一课题，进行细致地梳理，新见迭出，饶有趣味，十分精彩。如果作者还能够在“尺牍何以成为出版热点”、“两种尺牍出版物在什么区域什么程度上出现商业竞争”等出版问题上再深入开掘一番，提供出一些实例性的新鲜史料，应该更能够说明这场“尺牍大战”的意义。当然，关于明清时期出版业中的“盗版”，似乎也可以深入讨论一下。因为，在我看来，当时的翻刻，与当代法律层面上的侵权盗版，显然是两回事。

黄义枢《〈曲谱大成〉编纂问题辨疑》和杨国彭《胡季堂与〈通志堂经解〉的补刊》，分别围绕这两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典籍在乾隆年间的编纂和补刻问题展开细致梳理，对国家的文化政策、社会的阅读需求、个体的能力专长乃至文本内部证据都予以关注和揭示。特别是杨文，还深入挖掘胡季堂的交游网络之于其补刊事件的襄助，使其研究颇具“书籍的社会史”意识。

梁明青的《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一文，对“同光中兴”时期各地官书局兴起的背景下，云南省顺应时代需要而诞生的云南书局和云南官书局的实际运作情况做考察，从目验存世文献实物入手，厘清两书局创设始末和出版业绩和特色。使人对这一偏居西南隅的省份，在中国近代出版与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全面的认识。

本期中最令人惊喜的是胡珂、鲁明的《宋本〈册府元龟〉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始末考》。这篇文章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绵密的考证，完整还原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末的六十馀年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机构接力整理出版北宋四大部书中体量最巨的《册府元龟》的全过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搜集史料和分析论证时，兼具文献学和出版学的思路和方法，或者说，他们天生就具备更广阔的研究思路和分析工具。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文献最终呈现在学界面前的样貌，总是多种客观条件互动的结果，是学术界、收藏者（单位）和出版界反复“博弈”之后不得不然的选择；而一部巨著的产生，往往会经过许许多多、许多人的努力，成功与遗憾往往并存其间。正因如此，如张元济这样伟大的出版家的努力才弥足珍贵。

导言的最后，我想说，“编纂与出版”这一专栏的设立，是希望学术界多进行一些“跨界研究”，跨出文献学，去出版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等领域，用更多的学术视角、更新鲜的研究方法来反观文献的意义。这也正是我的期待。